

吉年生吉子？ 中国生肖偏好的实证研究^{*}

——基于 1949~2008 年出生人口数

马 妍

【内容摘要】人为选择特定生肖年份进行生育的现象似乎愈演愈烈，然而这种生肖偏好是否在我国客观存在？本文围绕这一问题，充分利用 1949~2008 年的出生人口数据，并借鉴人口统计学中的年龄准确性检验指数来检验我国生肖偏好的存在性。结果显示，从全国宏观层面上，无论是单一年份、单一生肖还是十二生肖整体都不存在生肖偏好，出生人口规模的波动更多是由于人口惯性的影响。因此，破除生肖偏好的迷信，引导正确的生育观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生肖偏好；出生人口；年龄准确性检验指数

【作者简介】马妍，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北京：100872

Having an Auspicious Baby in an Auspicious Year? Empirical Research on Zodiac Preference in China, 1949–2008

Ma Yan

Abstract Zodiac preferences seem to be increasingly popular in our society. However, anecdotal evidence does not necessarily reflect an objective tendency. Using birth data from 1949–2008 in China, this paper applies the indices of age preference to testing preferences for Chinese Zodiac in fertility. Results show that at the national level (whether for a single year, or a single Chinese Zodiac, or the whole twelve Chinese Zodiac), Zodiac preferences actually do not exist. Annual fluctuations in births are largely a result of changing population momentum built in the age structure. It is therefore important to overcome superstition of Chinese Zodiac, and to advocate the rational fertility concept in our society.

Keywords Preference of Chinese Zodiac; Births; Indices of Age Preference

Author Ma Yan is PhD student, Center for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Studies,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872. Email: sprhgm0811@126.com.

* 本研究是国家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基地重大课题“中国人口转变道路的理论研究”成果的一部分，项目编号：05JJD840146，并受中国人民大学研究生科学研究基金项目资助，项目名称：出生与命运——队列出生人口规模对队列人口教育福利的影响，项目编号：10XNH086。

在“吉年生吉子”心理的影响下,从2000年的“千禧龙宝宝”到2004年的“猴宝宝”,再到2007年所谓的“金猪宝宝”,人为选择特定生肖年份进行生育的现象似乎愈演愈烈,已酝酿成为一个新的社会问题。然而,根据特定的生肖选择生育是否是中国社会的群体性社会现象甚至是社会问题,抑或只是个别地方、个别人群的特殊现象,并未波及全国?我们似乎不能只从直观的感受或一些新闻报道来判断。是特定的生肖还是特定的社会事件影响着人们的生育决策,进而造成出生人口规模突变的宏观后果?社会是否将在这种人为选择生肖进行生育的影响下迎来了第四次出生高峰?为了探求这些疑问的答案,本文将利用建国60年来的出生人口数据,并结合多种年龄准确性检验指数来验证我国的生育生肖偏好是否存在,探究这种偏好究竟只存在于人们口口相传的生育迷信中,还是客观的存在于现实生活中,判断在一些特定年份出生人口规模异常增加或减少究竟是生肖偏好的影响还是其他因素作用的结果。

目前对于人为选择生肖进行生育的这样一种生肖偏好并没有一个明确的界定,因此本文将生肖偏好界定为:人们根据民间相关民俗或迷信的说法,认为出生在特定生肖所对应年份的婴儿将享有某些特殊的好运,因而选择在某些生肖对应的年份生育自己的孩子。其结果是造成这些年份的出生人口规模激增。与之相对应,生肖回避则指人们由于认为某些生肖会给孩子带来厄运,而刻意选择不在于某些生肖对应的年份生育孩子。进而导致这些年份的出生人口规模骤减。

关于特定社会事件和特定生肖偏好的研究,迄今学界对此的关注比较有限。Goodkind(1991)研究表明,包括中国大陆、台湾、香港、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地在内的亚洲华人普遍存在喜欢在龙年生孩子的现象,而且这一现象随着避孕技术的普及而日益凸显。我国学者曾指出,所谓的“停电婴儿”和“羊年不宜生子”都是得不到事实支持和证实的错误结论(段成荣,2003)。笔者认为,仅从“龙”或“羊”某个单一生肖出发,难以认定我国是否存在生肖偏好。因此,本文将从十二生肖的整体层面来看待和检验这个问题,同时多纳入几个轮回的数据来参与计算,能够从一定程度上排除数据随机波动的影响,唯其如此,才能避免真实情况被偶然性所掩盖,使我们尽可能科学地判断生肖偏好的存在性。检验生肖偏好或生肖回避是否存在,不仅关系着家庭的幸福与未来,而且直接影响到国家在教育、卫生及社会保障等众多方面的规划和建设,对于整个社会都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本文所使用的数据主要来自于国家统计局编制的《中国人口统计年鉴》及其官方网站公布的历年统计公报。由于出生人口数据的质量将影响到对问题的判断与分析结果,因此首先需要讨论数据的可靠性。学界对上世纪90年代以前的数据质量基本表示认可,然而90年代以来的出生漏报和瞒报等影响数据质量问题的日益凸显,导致了一系列以出生人口数据为基础的研究产生了众说纷纭的结果。2007年,翟振武教授和陈卫教授根据教育统计数据重构了2000年人口普查0~9岁人口的性别年龄结构,并以此为基础对1990年代历年的出生人数进行了估计。结果他们发现“估计的结果在总体上与国家统计局公布的人口变动抽样调查结果基本一致”(翟振武等,2007)。因此,基于国家统计局所公布数据的相对权威性,以及相关研究表明的出生数据质量仍比较可靠的判断,我们认为使用统计局公布的数据对本研究的结论不会有质的影响,所以本文使用的1949~2008年的出生人口数据均是没有进行调整的官方公布数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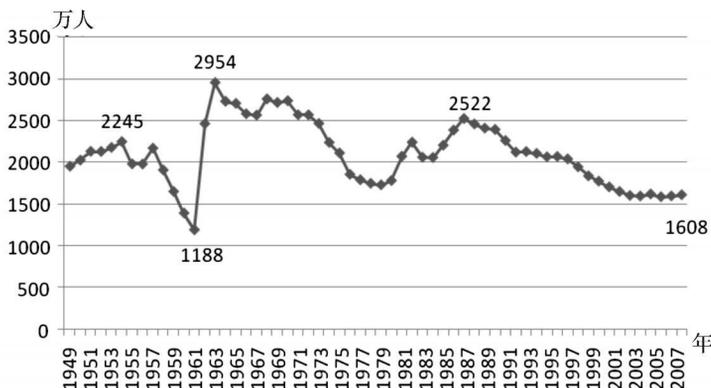
1 我国历年出生人口规模的变动

数据显示,我国的人口发展历程“一波三折”,导致人口年龄结构呈现“三凸三凹”的特征,即我国的出生人口规模经历了三次出生高峰和相对应的三次出生低谷。实际上,目前学界对三次出生人口高峰起止时间的认识上并没有达成一致(陈友华,2008)。根据陈友华教授最近的研究界定,从

数量的视角考察,我国已经出现的三次出生高峰分别是在:1949~1958年、1962~1973年、1982~1998年,而两次出生高峰之间的年份就是相应的出生低谷期(陈友华,2008)。同时他提出“进入21世纪后,直至2050年,在此期间中国既不会出现新的出生高峰,也不会出现新的出生低谷”。图1是建国以来我国出生人口规模的变动情况,从中可以清晰地观察到三次出生高峰及其相应的峰值点:第一次出生高峰的峰值出现在1954年,当年的出生人口达到2245万人,与之相对应的是马年;第二次出生高峰的峰值出现在1963年,这是建国以来出生人口规模的最高峰,达2954万人,与之相对应的是兔年;而第三次出生高峰的峰值出现在1987年,与之相对应的也是兔年,然而这是否就意味着在这些波动中隐藏着人们的生肖偏好呢?还需要通过进一步的检验才能得出结论。

图1 1949~2008年我国历年出生人口规模变动

Figure 1 Change of Annual Births of China, 1949-2008 (10 Thousand Persons)



数据来源:①1949~1953年:根据总人口和出生率推算得出,国家统计局人口和社会科技统计司编《2002中国人口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出版社,2002年;②1954~2000年:引自《2002年中国人口统计年鉴》;③2001~2008年:引自国家统计局2001~2008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年度统计公报。<http://www.stats.gov.cn/tjgb/>

2 我国出生人口规模随生肖变化的变动

根据十二生肖的排列顺序将1949~2008年的出生人口进行划分,刚好有5个轮回。下面将结合生肖来考察我国出生人口规模的变动情况。由于1949年是牛年,因此本研究的划分以“牛”为每一轮生肖的起始^①。

2.1 出生人口规模随生肖变化的变动未呈现出一致的趋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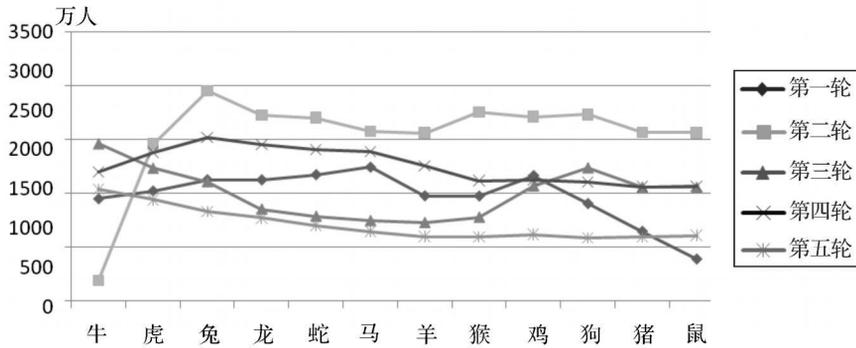
图2展示了60年以来5个生肖轮回对应的全国出生人口规模变动。首先可以看到按十二生肖划分的每一轮出生人口规模的变动都没有呈现出一致的趋势。即:羊年并不是每一轮变动中的最低点,而龙年、猪年等被视为比较吉祥的年份,其出生人口规模也不是各生肖中的最高点。其次,每一轮变动的最高点并没有局限在特定的生肖,如第一轮的最高点是马年、第二轮是兔年、第三轮是牛年、第四轮是兔年、第五轮是牛年。并不能据此认为两轮出现的兔和牛就意味着人们对兔或牛存在生肖偏好,因为这种隔轮出现的特点,更可能是人口惯性作用的结果。再者,随着时间的推移,

① 需要说明的是,严格意义上,应该选用农历的出生人数来进行分析。但由于资料的限制,无法得到这样的资料。为此,不得不选用公历的出生人数资料作为替代。但经过对人口普查所提供全国人口出生年份和月份分布资料的初步分析,可以看到,近百年来,我国每年出生人口的出生月份分布是非常稳定的,没有明显的系统性变动。因此,我们认为,这样的替代是可以接受的(段成荣,2003)。

各生肖对应年份的出生人口规模呈现出趋同的态势,即它们之间的差异在不断缩小,最后一轮(1997~2008年)的变动趋势已经较为平滑,各生肖之间的年度出生人口规模已经较为接近。

图2 我国年度出生人口规模的五轮生肖变动

Figure 2 Five Turns of Chinese Zodiac Change for Annual Births (10 Thousand Person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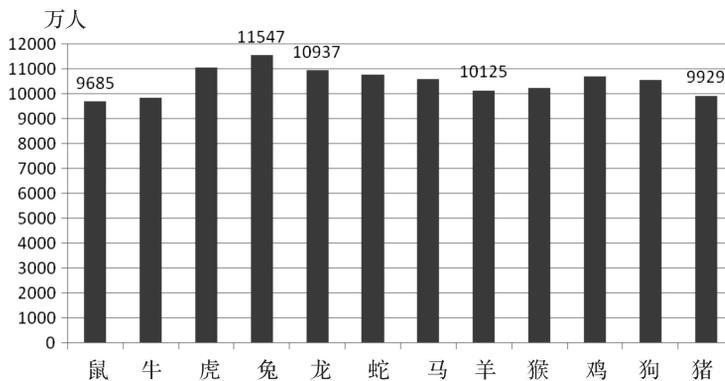
数据来源:同图1。

2.2 各种生肖的总计出生人口规模存在一定差异但不足以表明生肖偏好存在

为了消除潜在的随机波动的影响,我们将每种生肖对应年份的出生人口数加总来比较60年来各种生肖的总计出生人口数。如图3所示,1949~2008年间,兔年出生的人口最多,达到1.15亿人;而鼠年出生的人口数最少,仅为9728万人;两者相差1862万人,相当于2008年全国出生人口的1.2倍。在这中间,最被偏好的龙年出生人口总数比兔年和虎年都少,而羊年虽然被冠以“不宜生子”,但羊年的出生人口总数较鼠、牛和猪年都多。如果我们回顾一下历史,这种看似存在偏好的变动趋势,实际上受到了特定年份的特殊社会背景及社会事件的影响。

图3 1949~2008年全国各种生肖的出生人口数合计

Figure 3 Change of Total Births of Each Chinese Zodiac 1949-2008 (10 Thousand Persons)



数据来源:同图1。

首先,我们关注出生人口总数最多的兔年。根据表1可以发现兔年包括了1963年和1987年,按照陈友华对我国三次出生高峰的划分标准,这两个年份分别是第二次和第三次出生高峰的峰值点,尤其是1963年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出生人口数量最多的年份,在这样两个重要年份的影响下,兔年出生的人口数不可避免地存在偏多的特征。而作为我国出生人口最少的1961年,其所对应的牛年虽然在这一特殊年份的影响下出生人口总数在十二生肖中较少,但其并不是出生总数最少的生肖,反而是其临近的鼠年的加总出生人数最少,虽然1960年比1961年多出生了将近200万人,但

表 1 1949~ 2008年各种生肖对应年份

Table 1 Chinese Zodiac and Its Corresponding Calendar Year 1949- 2008

	第一轮	第二轮	第三轮	第四轮	第五轮
牛	1949	1961	1973	1985	1997
虎	1950	1962	1974	1986	1998
兔	1951	1963	1975	1987	1999
龙	1952	1964	1976	1988	2000
蛇	1953	1965	1977	1989	2001
马	1954	1966	1978	1990	2002
羊	1955	1967	1979	1991	2003
猴	1956	1968	1980	1992	2004
鸡	1957	1969	1981	1993	2005
狗	1958	1970	1982	1994	2006
猪	1959	1971	1983	1995	2007
鼠	1960	1972	1984	1996	2008

总体上鼠年出生人口总数仍是最少的。同样,作为社会大众热力追捧的2000年(千禧龙宝宝)、2007年(金猪宝宝)和2008年(奥运宝宝),其所对应的龙年、猪年和鼠年并没有因为这样的特殊社会事件使其所对应生肖的出生人口总数有重大波动。因此我们认为,虽然特定的社会历史事件对其所对应生肖年的出生人数有一定程度的影响,但是当我们用60年中5个轮回的数据来考察生肖偏好时,这些特殊社会事件的影响就受到一定程度的抵消或

平滑。所以我们不能仅凭十二生肖总计出生人口规模的差异,认定这是生肖偏好导致的结果,而需要进一步通过各种指数量化检验生肖偏好是否存在。

3 运用年龄准确性检验指数检验生肖偏好存在与否

人口学研究中经常使用年龄准确性指数来检验某一数据是否存在年龄“堆积”,也就是人们在报告自己的年龄时,是否对以某一数字结尾的年龄有特别的偏好或者回避。检验年龄堆积的指数主要包括:年龄偏好指数、惠普尔指数、迈叶斯指数、年龄准确性指数和联合国综合指数(查瑞传,1991)。由于十二生肖随着时间的推移轮回,就如同以0~9为结尾的数字在人口年龄中反复出现。因此,本文将某一特定生肖视为以某一数字结尾的年龄,借鉴各种年龄偏好指数检验的思路,在进行相应调整的基础上,结合各种指数的特点及数据的可及性,主要运用年龄偏好指数、惠普尔指数和迈叶斯指数从不同侧面来检验生肖偏好存在与否。

3.1 年龄偏好指数(IPA)检验显示单一年份的生肖偏好不存在

年龄偏好指数是对特定年龄上的堆积现象进行检验(查瑞传,1991),其主要的原理是将特定年龄的人口规模与其前后相邻年龄的人口规模对比,来检验该年龄是否存在年龄偏好。因此,我们将1949~2008年间的每一年视为年龄组中的一个单岁组,计算该年份是否存在人数“堆积”,并将该年份与生肖对照来确定人们对某个单一生肖是否存在偏好。调整年龄偏好指数得到的生肖偏好指数的计算公式为:

$$IPA_t = \frac{P_t}{\frac{1}{3} \times (P_{t-1} + P_t + P_{t+1})} \times 100$$

其中 IPA_t 代表t年的生肖偏好指数, P_t 代表t年的出生人口数, P_{t-1} 和 P_{t+1} 分别代表t-1年和t+1年的出生人口数。 IPA_t 越接近100表明人们对该年份或该生肖越不存在偏好;大于110说明生肖偏好存在,大得越多表明偏好越严重;而 IPA_t 小于100则说明人们对该生肖不仅没有偏好,反而有一定程度的回避。但是由于出生人口存在一定程度的随机波动,因此,我们不能将无偏好的标准界定在100这个点,而是应当从统计学置信区间的角度出发,认为只要 IPA_t 在 100 ± 5 的范围内

波动都不存在生肖偏好。

根据判断标准,表2中我们所计算的58个年份的偏好指数中仅有4个年份不在我们设定的置信区间范围内,其余年份的偏好指数均表明该年份并不存在生肖偏好。而4个“有偏好”或“有回避”的年份分别是1957年(第一轮鸡年)、1961年(第二轮牛年)、1962年(第二轮虎年)和1963年(第二轮兔年),然而这并不表明这4个年份存在生肖偏好。在我国的发展变化历程中,这四个年份都是因为特定的历史事件导

致出生人口剧烈变动的年份,因而它们与相邻年份的出生人口规模相比有较大的差异,从而导致了偏好指数值明显有偏。从中我们不难发现,用年龄偏好指数来检验生肖偏好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它容易受出生人口剧烈波动的影响而降低了结果的可靠性,而且我们只能将某一生肖与其相邻的2个生肖相比,而不能将其置于12生肖的整体中进行比较,这就存在一定的片面性。因此,我们将运用其他指数来进一步检验生肖偏好是否存在。

3.2 惠普尔指数(Whipple's Index)检验表明每个生肖的偏好或回避均不存在

与年龄偏好指数不同,惠普尔指数是对整个年龄结构中以某一数字结尾的年龄是否存在偏好进行的综合检验(查瑞传,1991)。年龄总是以0~9结尾且反复出现在年龄结构中,就如同十二生肖的循环出现,因此将该方法用于生肖偏好检验具备了可行性。此外,我们使用各生肖的加总出生人口数进行计算,可以部分消除出生人口规模波动的影响。因此,笔者认为运用惠普尔指数进行出生人口是否存在生肖偏好的检验,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克服年龄偏好指数的局限性,而且某一生肖可以与其他11个生肖进行比较,更有助于我们得出可靠的结论。然而年龄尾数的循环周期为10而生肖的循环周期为12,因此,我们在使用惠普尔指数进行检验的时候,在原有计算方法的基础上进行了一些调整,调整后的具体计算公式如下:

$$W I = \frac{P_{1i} + P_{2i} + P_{3i} + P_{4i} + P_{5i}}{\frac{1}{12}P} \times 100$$

其中 P_i 为第 t 轮(本文中 $t=1,2,3,4,5$)第 i 个生肖对应年份的出生人口数, P 为60年的出生人口数的加总。表3是我们计算得到的每种生肖对应年份的加总出生人口数以及每种生肖的惠普尔指数。通常当 $W I=100$ 时,表明年龄分布均匀,不存在堆积或者偏好现象; $100 < W I < 110$ 可以

表2 借用年龄偏好指数检验出生人口的生肖偏好^①

Table 2 Testing Preference of Chinese Zodiac Using Age Preference Index

	第一轮	第二轮	第三轮	第四轮	第五轮
牛	—	70.76	101.72	99.47	101.11
虎	99.48	111.78	98.50	100.62	100.21
兔	101.69	108.83	102.10	102.76	99.19
龙	99.24	97.62	96.70	99.80	100.11
蛇	99.66	101.25	99.55	99.53	99.73
马	105.27	98.61	99.54	101.66	99.86
羊	95.73	97.34	98.67	100.09	99.13
猴	96.85	102.94	95.73	97.75	99.38
鸡	107.49	99.23	101.99	100.46	101.19
狗	99.93	102.37	105.48	100.30	99.10
猪	100.00	97.87	97.21	99.28	99.92
鼠	98.65	101.34	97.62	100.54	—

数据来源:同图1。

① 由于年龄偏好指数的计算需要有前后年份的相应数据,而我们无法获得1948年和2009年的出生人口数据,因此无法计算1949年和2008年的年龄偏好指数。

认为无明显偏好;如果 $110 \leq W I < 130$ 说明存在年龄偏好;而当 $W I \geq 130$ 时,说明偏好比较严重;当

表 3 借用惠普尔指数检验出生人口的生肖偏好

Table 3 Testing Preference of Chinese Zodiac Using Whipple's Index

	出生人口数(万人)	惠普尔指数
鼠	9685	92.26
牛	9841	93.74
虎	11044	105.20
兔	11547	109.99
龙	10937	104.18
蛇	10775	102.64
马	10607	101.04
羊	10125	96.45
猴	10224	97.39
鸡	10694	101.87
狗	10567	100.66
猪	9929	94.58
合计	125975	

数据来源:同图 1。

$W I < 100$ 时,表明年龄偏好不存在,甚至存在一定程度的年龄回避(查瑞传, 1991)。根据这一标准,以及上文我们构造的置信区间范围,从表 3 中可以看到:12 生肖中有 7 个生肖的惠普尔指数都落在 (95, 105) 的置信区间范围内,而且差距很小,没有表现出明显的生肖偏好。其他 5 个生肖中,鼠、牛和猪存在比较微弱的生肖回避,而虎和兔存在同样比较微弱的生肖偏好现象。虽然惠普尔指数运用加总数据计算偏好,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克服出生人口规模波动的影响,但是三年“困难时期”与其前后年份出生人口规模的差异十分巨大,这样的起伏可能是运用加总数据也无法平滑的。因此我们

认为,对应年份出现的轻微生肖偏好和回避不能认定为真正意义上的偏好或回避。反而是传统生育文化中偏好的龙和回避的羊这 2 个生肖的检验结果都没有表现出应有的偏好或者是回避。

3.3 迈叶斯指数 (Myers' Index) 检验证明总体上我国的生肖偏好并不存在

与惠普尔指数只能检验年龄结构中以某一特定数字结尾的年龄是否存在偏好不同,迈叶斯指数并不特别关注某个特定年龄的堆积情况,而是从总体上检验人口的年龄结构是否存在异常(查瑞传, 1991)。借鉴这样的思路,我们可以借用迈叶斯指数从总体上检验我国的出生人口是否存在生肖偏好。

根据迈叶斯指数的构造原理^①, 计算步骤如下(见表 4):

- 1) 将 60 年间各种生肖的出生人数分别加总得到表 4 第 (1) 列;
- 2) 将每种生肖的总出生人口减去第一轮 (1949-1960 年) 其所对应年份的出生人口得到表 4 第 (2) 列;
- 3) 给每种生肖对应的两组总出生人口数分别赋 2 个权数 (第 (3) 列和第 (4) 列)
- 4) 计算混合人口 (5) = (1) × (3) + (2) × (4);
- 5) 将各生肖混合人口加总后分别计算每种生肖混合人口占总混合人口的比重, 得到表 4 第 (6) 列;
- 6) 然后将第 (6) 列数字分别减去 1/12 并取绝对值得到表 4 第 (7) 列, 将第七列数加总得到 4.83
- 7) 由于计算中使用了 2 组人口, 因此迈叶斯指数 $MI = 4.83 / 2 = 2.41$ 。

通常情况下,迈叶斯指数的值越接近 0 说明年龄堆积的程度越小。而当迈叶斯指数小于 5 时,可以认为基本不存在年龄偏好。因此我们认为,从 60 年来整个出生人口规模的变动来看,我国的

① 关于迈叶斯指数的构造原理详见查瑞传主编《人口普查资料分析技术》31~36页。

出生人口在总体上不存在生肖偏好。

表 4 借用迈叶斯指数检验出生人口的生肖偏好

Table 4 Testing Preference of Chinese Zodiac Using Myers' Index

	1949~2008年出生人口数(万人)	1961~2008年出生人口数(万人)	权数 1	权数 2	混合人口(万人)	百分比分布	与 1/12 差的绝对值
	(1)	(2)	(3)	(4)	(5)	(6)	(7)
鼠	9685	8296	1	11	100941	7.30	1.03
牛	9841	7891	2	10	98592	7.13	1.20
虎	11044	9021	3	9	114321	8.27	0.06
兔	11547	9419	4	8	121540	8.79	0.46
龙	10937	8810	5	7	116355	8.42	0.08
蛇	10775	8600	6	6	116250	8.41	0.08
马	10607	8362	7	5	116059	8.40	0.06
羊	10125	8147	8	4	113588	8.22	0.12
猴	10224	8248	9	3	116760	8.45	0.11
鸡	10694	8527	10	2	123994	8.97	0.64
狗	10567	8662	11	1	124899	9.03	0.70
猪	9929	8282	12	0	119148	8.62	0.29
合计					1382447		4.83

注:迈叶斯指数 $(MI) = 2.41$, 数据来源: 同图 1。

4 小结与讨论

无论哪一种指数都不是对生肖偏好的精确检验。由于我国在特定时期内出生人口规模出现过十分剧烈的起伏波动, 因此, 不可避免地会对我们的检验结果产生或多或少的影响, 但这并不影响我们对整体趋势的判断。三种检验方法均表明, 就全体人口的宏观角度而言, 我国民众在进行生育决策时并没有大范围地刻意选择某一生肖作为孩子出生的时间。我们认为在人口结果上, 我国并不存在生肖偏好。我国出生人口规模的波动更多地是由于人口惯性的影响, 这符合人口规律。我们不应仅凭媒体片面的报道就认为“金猪宝宝”和“奥运宝宝”会带来我国第四次出生高峰。事实证明, 这些年份的出生人口并没有显著增加。近年来在稳定低生育率的前提下, 我国每年的出生人口已经比较均衡, 并没有出现大幅度的波动, 也没有如同预测的那样, 在人口惯性的影响下, 由于第三次出生高峰的出生人口进入婚育旺盛期而出现新的出生高峰。这是因为我国的人口负增长惯性的不断积累将逐渐削平人口高峰(王丰等, 2008), 而使未来的几十年内可能不会再出现出生高峰(陈友华, 2008)。

然而, 由于生育具有三维性——数量、时间和性别(顾宝昌, 1992), 因此生肖偏好与否本质上是育龄夫妇或家庭在子女出生时间上的一种生育决策。所谓生育决策是指夫妇对生育和养育孩子成本与收益的比较, 或者是在家庭资源约束条件下实现生育效益最大化而进行的选择(李建民, 2004)。虽然我们通过定量检验没有发现生肖偏好的存在, 但并不意味着我国的育龄夫妇完全没有生肖偏好, 之所以偏好没有反应在宏观出生人口数据上, 可能是因为家庭在生育时间的决策上更多的受到诸如家庭经济条件、家庭发展计划等其他多种因素的影响, 而淡化了生育文化的影响, 或者说生育文化不能直接作用于家庭生育时间的选择进而直接影响到生育行为, 它可能需要通过其他的中间变量将其影响传递到最终的生育行为, 因而其影响也便无法直接通过出生人口数据显现出来。此外, 一个家庭的生育决策至少在家庭成员本身看来是理性的, 家庭效用最大化作为一种主观

个体感受,其理性与否不是由外部判定的。因此,个体结果的理性不一定导致集体结果理性,反之个体决策不理性也不一定导致集体结果的不理性。所以,我们不能只依据宏观人口后果的状况来判断微观人口行为的真实状况,还需要进一步借助定性分析来把握微观人口行为的特点。

此外,基于大众传媒对家庭生育选择具有一定的影响力,对生肖偏好的错误宣传可能会误导民众做出不理性的生育决策。相关研究表明:出生规模较大的队列人口,其福利明显不如出生规模较小队列的人口(Easterlin, 1980)。扎堆生育,使得本来比较平稳的年度人口规模曲线变成突升突降,势必造成一系列严重后果:首先是个人将面临“一生的拥挤”,包括入托、升学、就业、婚姻、养老等;同时,出生人口规模的非随机波动,可能导致国家在对教育、医疗等社会资源进行配置时难以准确判断和合理规划,从而造成资源配置的无序和低效,给社会发展带来不利和不确定的影响。因此,提倡人们以顺其自然的态度来对待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生肖,形成生肖不会改变命运的合理生育观念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感谢!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刘爽教授、陈卫教授、宋健副教授对本文的指导和建议。

参考文献 /References

- 1 段成荣,王艺佳.从“停电婴儿”到“羊年不宜生子”——兼论如何科学地分析人口现象.人口研究,2003 3: 72~77
Duan Chengrong and Wang Yijia. 2003. From “Great Blackout Baby” to “Inadvisable to Bear a Baby in the Year of Sheep”: Research on How to Analyze Population Phenomena Scientifically. Population Research, No. 3: 72-77
- 2 翟振武,陈卫.1990年代中国生育水平研究.人口研究,2007; 1: 19~32
Zhai Zhenwu and Chen Wei. 2007. Chinese Fertility in the 1990s. Population Research, No. 1: 19-32
- 3 陈友华.出生高峰与出生低谷:概念、测度及其在中国的应用.学海,2008; 1: 13~26
Chen Youhua. 2008. Baby Boom and Baby Bust: Concepts, Measurements and its Application in China. Academia Bimestris, No. 1: 13-26
- 4 王丰,郭志刚,茅倬彦.21世纪中国人口负增长惯性初探.人口研究,2008; 6: 7~17
Wang Feng, Guo Zhigang, and Mao Zhuoyan. 2008. A Preliminary Study of China's Negative Population Growth Momentum in the 21st Century. Population Research, No. 6: 7-17
- 5 顾宝昌.论生育和生育转变:数量、时间和性别.人口研究,1992; 6: 1~7
Gu Baochang. 1992. On Fertility and Fertility Transition: Number, Timing and Sex. Population Research, No. 6: 1-7
- 6 李建民.生育理性和生育决策与我国低生育水平稳定机制的转变.人口研究,2004; 6: 2~18
Li Jianmin. 2004. Fertility Rationale, Fertility Decision-making and Transition of Mechanisms in Stabilizing Low Fertility in China. Population Research, No. 6: 2-18
- 7 查瑞传主编.人口普查资料分析技术.中国人口出版社,1991: 25~36
Zha Ruichuan. 1991. Analytical Techniques of Chinese Census Materials. Beijing: China Population Publishing House. 25-36
- 8 Richard A. Easterlin. 1980. Birth and Fortune: the Impact of Numbers on Personal Welfare.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9 Daniel M. Goodkind. 1991. Creating New Traditions in Modern Chinese Populations: Aiming for Birth in the Year of the Dragon.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 17: 663-686